

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ISSN 1004-1710,CN 46-1012/C

《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走出去”与“走进东南亚市场”: 华侨华人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作用机制
作者: 陈经纬
DOI: 10.15886/j.cnki.hnus.202506.0514
收稿日期: 2025-06-28
网络首发日期: 2026-01-14
引用格式: 陈经纬. “走出去”与“走进东南亚市场”: 华侨华人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作用机制[J/OL]. 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s://doi.org/10.15886/j.cnki.hnus.202506.0514>



网络首发: 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 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 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 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 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 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 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 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 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 录用定稿一经发布, 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 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 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 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 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 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 CN 11-6037/Z), 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XXXX

“走出去”与“走进东南亚市场”： 华侨华人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作用机制

陈经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 金融研究所, 北京 100710)

[摘要] 海南实施“新时代下南洋”对外经济合作计划是构建海南现代产业体系和实现“走出去”与“走进东南亚市场”并逐步参与国际分工、不断融入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和提升自身价值的有效方式。琼籍华侨华人具有“家乡情”、“硬实力”，“想参与”且“有能力参与”，用好这部分资源对海南发展外向型经济与自由贸易港建设至关重要。当前，以琼籍华侨华人为主体在海南建立“新型工业化园区”以及开展“合资金融”具有一定可行性。这些举措既是深化海南和粤港澳大湾区与东南亚周边国家实现区域工业化互补合作与协同增效的新尝试，又是务实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对外开放经济合作的新模式。只有实现侨务侨联工作方向性转变与改革，发挥东南亚国家华侨华人社团等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经济合作中对华侨华人采取一定的“所有权”让渡制度安排，才能实现海南与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内产业互动，同时为海南“走进东南亚市场”提供保障。

[关键词] 华侨华人; 海南自由贸易港; 新型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5886/j.cnki.hmus.202506.0514

一、引言

2024年12月17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三亚听取海南省有关领导工作汇报时强调, 海南“要着力构建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并在“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过程中对主导产业进行“补链延链、优化升级”^[1]。2018年4月, 党中央作出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出台《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简称“中央12号文”), 决定在海南布局新一轮对外开放改革——在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并稳步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 在中央12号文中, 有关“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等核心内容成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最重要的目标。2022年6月1日,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正式颁布, 进一步把构建海南现代产业体系作为自由贸易港“1+6+4”制度设计之首要目标。这意味着, 在未来30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当中, 推动海南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将是重要一环, 且只有构建与海南自身条件相互适应的独特的且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产业体系, 才能决定它不同于其他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发展路径, 才是实现海南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和关键所在^[2]。因此, 落实党中央部署并探索海南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和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新思路、新路径及新实践方法, 是国内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所关切的重要议题。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快, 我国开放型经济在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同时正经历从“引进来”为主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阶段性转型。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问题是, 虽然从整体性角度看, 中国的“引进来”和“走出去”两者之间呈现出齐头并进的趋势, 但从区域视角看, 不同地区会因自然资源禀赋、人文历史文化及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别而采取差异化行动策略。有的区域(如“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东部沿海

[收稿日期] 2025-06-28

[作者简介] 陈经伟(1967-), 男, 汉族, 海南琼海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 主要从事经济金融理论、自贸区(港)改革理论研究。

地区)更加侧重于“走出去”;有的区域(如中部省份地区)更加侧重于在“引进来”的同时接受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因此,本文基于海南未来发展新路径应侧重于“走出去”的基本研判而展开研究。一方面,海南新一轮改革是一项在新形势下以全国最大经济特区为基础、以外向型经济发展为目标定位的国家区域战略布局。另一方面,海南作为地属祖国最南端的岛屿经济体,“背靠”祖国大陆,是通往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对外开放重要门户。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国际区位优势,在对接我国与东南亚国家这两大世界经济体以及实现我国“走出去”目标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鉴于海南是我国第三大侨乡,具有丰富的华侨华人资源(特别是在东南亚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①,在《方案》明确提出海南应“加强与东南亚国家交流合作”的要求下,本文聚焦琼籍华侨华人这一群体,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分析这一群体在海南“祖籍地”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意义在理论层面体现为拓宽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边界;在实践层面为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制度顶层设计、落实《方案》各项改革措施以及改进侨务工作方法提供依据与指引。

关于海外华侨华人在我国对外开放中的作用,不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学界及政府有关部门,已基本上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独特”且“不可或缺的”。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筹划经济特区的时候就充分考虑了海外华侨华人这个因素;1990年4月7日,他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人时说:“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是不管用的……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4]这句话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独特机遇论”侨务思想,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侨务工作奠定了基础,后来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华侨“优势论”和“资源论”以及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华侨“三个大有作为”和“四个积极作用”正是这一侨务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展^[5]。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时代国内外发展新特点,继承并拓展了邓小平同志的“独特机遇论”的思想,在2013年10月4日出席马来西亚各界华侨华人代表欢迎午宴上曾指出“没有华侨华人的努力,就没有中马关系今天的大好局面……希望广大华侨华人朋友继续发挥优势,积极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2023年5月8日会见第十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指出,海外侨胞具有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力军。

在学界,以“华侨华人”为议题的研究已延续多年,这些文献从不同学科和研究视角,分析了海外华侨华人在我国不同时期及改革发展进程中发挥的正向作用。有关琼籍华侨华人在海南经济社会建设中作用的研究,学界已有多项成果:涉及新中国成立前、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自2018年中央布局海南新一轮改革以来,学者也开始立足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这一崭新实践,围绕琼籍华侨华人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发挥的作用这一问题开展探讨,如:刘汉军(2022)的研究以“大侨务”观来推动海南东南亚侨务公共外交工作,并以此更好地服务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6];邵鹏鸣(2020)^[7]、周伟和武四帅(2024)^[8]分别对琼籍华侨华人参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开展经贸合作的优势及互动机制构建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但遗憾的是,相对于中央对海南新一轮改革布局战略而实施的大动作而言,就海南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充分发挥华侨华人“独特”作用机制,并以此加强海南自由贸易港与相关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国别领域)开展经贸合作为议题的基础性研究,不管是在重视度及学术成果数量上,还是在研究内容的深度上(尤其在指导政策制定之前瞻性层面),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从历史与现实及从不同社会层面深入探索。本文聚焦琼籍华侨华人这一“独特”群体和我国企业在新时代“走出去”趋势之特点,尝试从海南“走向东南亚国家”在经贸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行性进行深层次探讨。

二、琼籍华侨华人对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贡献及时代特征

我国东南沿海与世界各国的往来可追溯至古代。海南是华人向海外移民的四大口岸之一,主要面向的是东南亚国家(俗称“南洋”)^[9]。19世纪中叶,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国家沦为欧洲发达国家殖民地,

① 琼籍华侨华人约390多万人分布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80%以上主要居住在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越南、柬埔寨、文莱、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3]。

成为当时世界重要原料及初级产品输出或供应地,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加。人多地少的现实,使我国东南沿海居民生存压力加大。尤其是鸦片战争后,我国传统海禁政策日渐松弛与废弛,使得华南沿海地区民众可以出海。这为沿海民众大规模移民南洋提供了便利。相关材料表明:到20世纪30年代,因移民而定居南洋的华侨人数已达620多万人,占当时海外华人总数的79.13%。来自海南岛的移民占其中相当比重,构成了南洋华侨中的五大集团(一般指福建人、广东人、潮州人、海南人、客家人)之一。正是这一时期移民潮,决定了琼籍华侨华人的基本特性——主要以东南亚各国为住在国外^[10]。

海外华侨华人不仅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大部分人也在经济上对祖国及家乡与亲友做出了不少的贡献^[11]。因此,学界十分重视从“祖籍地”角度开展华侨华人的作用方式及机制研究。内容大致可归纳为参与祖籍地革命运动、经济建设、教育事业、公益事业及科技事业等方面^[12]。当然,琼籍华侨华人在海南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因不同时期内外因素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为海南家乡建设的方式是一个不断演变过程且具有时代特征。

在清以前各个朝代,朝廷对海南岛的开发建设是鞭长莫及或不够重视的^[13]。但从晚清开始,琼籍华侨华人就已经把东南亚国家各区的橡胶树移植到海南岛进行种植,引植橡胶获得成功后又开始引进咖啡、油棕、胡椒等热带作物。据历史资料显示:1916-1919年及1925年是琼籍华侨华人返回海南岛开辟胶园植胶较多的时期,植胶面积达十余万亩。到1934年,海南岛已有规模咖啡园14家,共植咖啡3万余株。与此同时,琼籍华侨华人还大力开发海南的锡矿业,到1936年共计投资约30余万元,矿区面积10万公顷以上^[14]。从一定程度上说,如今海南能够种植种类繁多的热带经济作物并形成不断发展的规模化产业,与当年琼籍华侨华人所作的贡献是息息相关的。另外,海南这一时期的商业经济发展也离不开琼籍华侨华人的努力。新中国成立前的海口、嘉积、文昌等地的许多商行、批局,旅社和建筑,基本上是琼籍华侨华人投资所建。

抗战时期,琼籍华侨华人对海南经济贡献方式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是开展难民救济;二是为抗战积极筹款。1939年2月10日,海南岛被日军侵占后,他们在香港成立了“琼崖难民救济会”。新加坡的琼籍华侨华人也成立了“琼侨救济琼崖难民会”。马来西亚的琼籍华侨华人也分别在森美兰、麻坡、吉隆坡、檳城等地成立“救济琼崖难民会”,广泛开展筹款救亡活动,并在湛江等地设立难民招待所拯救同胞^[14]。同一时期,中共琼崖特委多次致函海外侨胞请求援助,得到了众多琼籍华侨华人的积极回应。他们为琼崖独立总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经费支持,为琼崖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5]。

侨汇在助推侨乡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中也具有突出作用^[16]。张朔人(2009)^[17]和叶晓静(2024)^[18]有关海南侨汇问题的研究,阐述了侨汇在反哺海南地方社会经济当中的贡献。

总之,海南的近代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琼籍华侨华人反哺家乡的过程。他们是海南实业开发的倡导者和开发者,为海南发展现代经济奠定了初步基础^[19]。如今,海南已进入新一轮对外开放阶段,如何最大限度地把东南亚地区琼籍侨务资源中所蕴藏的能量凝聚起来,发挥他们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各项改革措施中的作用,无疑是一项新实践与新要求。

三、新时代琼籍华侨华人在海南“走出去”外向型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

经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已进入了党十九大所研判的“新时代”。新形势下,国内外经济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由于时间、地点、生产要素组合不一样,开放模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不可能照搬特区、开放城市的做法。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摸索出一条与之相适应的路子。”^[20]海南新一轮改革工作是一项全新的、特殊的试验任务,要在3.5万平方公里的海南岛上探索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新路径和新的实现形式,不能简单地模仿、照搬国内外其他自贸区(港)经验,只能在实践中探索出符合海南实际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路径。

投资发展路径理论认为,一个经济体的“引进来”和“走出去”依赖于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从全

① 直到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才把海南岛的开发建设作为一项重要议题提出来^[13]。

国视角来看,我国进入新时代后融入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程度加深,我国FDI(外商直接投资)与OFDI(对外直接投资)呈现相辅相成、齐头并进的发展趋势^①。现阶段的开放型经济形式已从引进外资向对外投资阶段转型,而统筹协调“引进来”与“走出去”之间关系。鼓励国内企业在产业链和供应链层面与外资企业展开合作成为一种必然^[21]。进一步来说,进入新时代后,我国FDI已成为我国企业获取国际资源、融入国际产业链与价值链进而实现进一步发展的有效方式。通过推动OFDI促进国内产业转型发展已成为重要方式之一。这也意味着,与时俱进的“引进来”制度安排从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促进“走出去”而设计。从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及不同产业层面看,我国当前的很多企业“走出去”并走向东南亚国家市场具有一定的可能性。这也是拓展东南亚市场是不可或缺的内容。

从我国企业“走出去”与“走进东南亚市场”过程来看,东南亚国家的多样性及其与我国互动的复杂性决定了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双边关系上只能采取多层次、差异性的经济外交策略及区别对待^[22]。企业必须及时掌握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基本信息,需要对市场当地进行市场风险防范与市场进入障碍化解。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对住在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现实较为熟悉,在我国企业“走进东南亚市场”过程中,他们可担当合作投资者、参谋、引导者、服务提供者等角色,对我国企业融入东南亚区域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牵线人及重要合作方双重作用,是连接我国企业“走出去”和走进东南亚国家市场的天然桥梁^[23]。简言之,我国企业“走出去”与华侨华人协作沟通网络及其合作机制,决定了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是推动我国企业“走进东南亚市场”和开展海外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东南亚地区华商是我国企业“走出去”和“走进东南亚市场”最重要合作伙伴之一^[24]。

已有研究表明,我国在2001—2016年期间对东南亚国家OFDI的区位选择与东南亚地区各国的华侨华人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从投资时间上看,两者之间的关系呈现显著性扩大趋势^[25]。这一方面说明了东南亚华侨华人与我国“走出去”企业的合作符合政治、经济发展要求。另一方面又说明了东南亚华侨华人在促进我国企业“走进东南亚市场”过程中具有较大潜力。本文所提出的海南应实施“新时代下南洋”经济合作计划,正是海南顺应以上大趋势并借助自由贸易港建设为契机,形成一种“产品下南洋”经济合作机制。具体而言,就是依据当前东南亚国家地区市场产业链结构和特点,在海南布局针对东南亚国家地区市场的专属性生产性基地。上述基地主要衔接一些粤港澳地区企业“走出去”和部分国内产业迁移东南亚国家地区过程中,承担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核心技术产品或半成品生产功能^②。一方面,基地建设过程中要有特别的制度安排——以琼籍华侨华人“引进来”为目标并形成深度合作与保障机制。另一方面,基地所生产产品或半成品主要“往南走”且以销往东南亚国家地区市场为基本定位,并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支持。

以上“引进来”和“走出去”互动机制作为一种创新的对外经济合作模式,主要基于一种“多赢”新理念——粤港澳地区企业和部分国内产业能“走出去”并参与国际竞争;企业的“走出去”行为能够促进海南及东南亚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尤其是海南当地老百姓与东南亚国家地区居民也能参与其中)。这也意味着,海南在未来若干年里将以“走出去”为区域经济发展与现代产业布局的目标^③,在与外商市场主体的经贸合作过程中逐步参与国际分工并融入国际产业链及价值链,并且在“走出去”过程中找到自身价值与产业发展具体定位。

“新时代下南洋”作为一种对外经济合作新思路,其核心内容:(1)充分发挥东南亚国家地区琼籍华侨华人最大价值——其对住在国的法律环境、市场及客户有深刻的了解,对海南融入国际产业链将起到重大助力作用。(2)解决“海南未来市场在哪里”或“海南如何在全球资源格局当中找准定位”等未来现代产业布局核心问题以及海南最大短板“走出去”策略。进一步来说,“新时代下南洋”对外经济合作计划

① 《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中国OFDI流量在2003—2020年间从28.5亿美元增加到1537.1亿美元,这18年间年均增长率高达31.1%且增长了约52倍;我国OFDI流量与存量在2017年已位列全球第3位和第2位且OFDI大于FDI。

② 本文认为,在岛内生产具有国际竞争力产品(或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的同时实现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双降”才是全岛封关“零关税”运作和自由贸易港区域经济发展初期目标。

③ 这也说明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在其初期阶段的主导产业布局和“引进来”初时就要充分考虑最终产品或服务“走出去”问题。

是以东南亚市场及其客户群体为服务目标,围绕东南亚客户群体需求在海南布局产业链和经济合作发展模式(如图1所示):即东南亚的侨商确定东南亚市场需要什么,海南商界才生产什么或者海南才进行精准招商,形成一种侨商+海南商界+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分享“更大蛋糕”的“共利共赢”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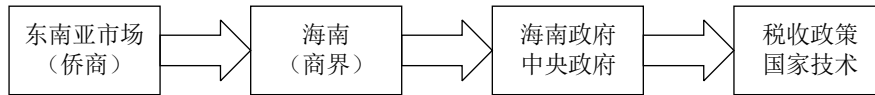


图1 “新时代下南洋”示意图

海南的岛屿经济体特点及其外向型区域经济发展目标,决定了其现代产业构建和未来产业发展路径。这与国内沿海地区尤其是内陆省份存在较大差异性,必须是“两个市场”(岛内岛外)及资源和市场都在外的“两头在外”;是参与全球科技产业革命和国际分工体系,并围绕着“海南拿什么东西到国际市场当中卖”的开放思维和操作目标进行布局。实施“新时代下南洋”对外经济合作计划实际上是“解决海南生产出来的制造业产品(或服务对象)销往哪里”即解决客户目标的问题。一方面,“下南洋”深受海南人民认可,它意味着对成功和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激发人民热情。另一方面,海南不仅拥有离南洋市场最近这一最大的区位优势,而且有中国内地强大的科技力量和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支撑,同时还有先民们留下的巨大华侨人脉资源,在东南亚国家各地区立刻就能打开市场。

我国对外开放在不同时期的海外华侨华人的作用机制是有差异的。改革开放初期主要以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问题为目标,与国外合作主要形式体现为“引进来”,但新时代背景和“双向开放”条件下,与国外经济合作目标除了“引进来”以外,还有一项重要功能是实现我国企业“走出去”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整体上,当前海外华侨华人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东南亚国家各地区的琼籍华侨华人在工商界、金融界、科技界、文化界和政界已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人才,且地位尤为突出^{①[26]}。这些“人力资源”对于海南实施“新时代下南洋”对外经济合作计划是一笔独特的财富,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独特机遇。不过,要充分地发挥这笔财富的作用,仅靠侨胞的乡情是不够的,需要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区域内开展创新对外经济合作模式。一方面,第一代琼籍华侨华人已耄耋之年,虽然心系家乡,但基本上都退出历史舞台。第二代与第三代甚至第四代琼籍华侨华人正处于事业爬坡状态,虽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但需要相应的事业进行衔接。另一方面,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互利才是基本的行为准则。只有探讨出能够实现琼籍华侨华人与海南经济组织合作共赢之路才能维持长久。

四、东南亚国家琼籍华侨华人与海南合作建立“新型工业化园区”的可行性

改革开放以来,虽说海南是中国最大经济特区,但其发展至今(含新一轮改革7年多)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两项重要经济指标还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②,仍然存在“三农”问题比较突出(即80%农村土地,60%农村人口,产业结构中农业占20%以上)、产业结构以“资源依赖型”为主且实体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薄弱等发展困境。同时,海南是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及岛屿经济体,偏离国际主航线且自身缺乏足够的发展腹地。高水平自由贸易港建设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与积累才实现。”^{③[27]}意味着,海南要在这样经济和产业基础及其底层逻辑之上建设自由贸易港是一项全新的探索,其主导产业布局及其经济运行要进行“大转折”(即“对内”向“融入国际产业链”转变)^③,且要更加侧重于“打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之制度设计,要在实践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省情的改革路径。

① 在东南亚国家琼籍华侨华人的政治地位尤为突出:在泰国,琼籍华侨华人曾经担任政府副总理、国会议长、国会副议长以及担任政府部长、副部长、警察总监等要职;在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副议长、马华公会总会长及国会议员、教育部副部长,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体育青年部政务部长、人力资源部部长等都有琼属华侨华人的身影;在新加坡,现任总理祖籍为海南等等^[26]。

② 国家统计局和海南省统计局2023年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在2022年和2023年,全国人均GDP分别为8.531万元/人、8.936万元/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69万元/人、3.922万元/人;这两年,海南省人均GDP分别为6.73万元/人、7.296万元/人,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1万元/人、3.32万元/人。

③ 当然,这种转变应该是系统性的,比如海南农业等传统行业除了面对国内竞争以外,还将面临东南亚等国际强者竞争;再如海南房地产业“断腕”转型升级等“过渡期”问题依靠单单市场力量很难解决而需要政府介入,同时国际认可的自由贸易港负面效应如“大型组织垄断市场经济”、“可能产生恶性竞争”及“新型政府失灵”等新问题也可能发生。

从现实情况看,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需要有大流量的经济活动来支撑。构建与海南岛屿经济体相互适应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在自由贸易港建设初期阶段与外向型经济合作发展历程当中,“补工业化”是不可或缺的内容^[28]。一方面,从中央12号文对海南未来30年主导产业要求具体内容看(如表1所示),中央对海南“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未来“现代产业体系”的界定及指导并不排挤工业化,除聚焦于高新技术产业外,还给海南预留出很广阔的发展空间,只要符合海南发展的绿色制造业及其产业链与新型工业化项目都可以进行尝试。另一方面,海南当前的第二产业实在太弱^①,在新一轮改革实践推进5年之后,“自贸港建设不能跨越工业化发展阶段”议题在2022年时在省内逐步成为一种共识,“补工业化”各项工作安排从2023年开始成为海南各级政府工作一项重要内容^②。

表1 中央对海南未来30年主导产业要求

行业	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	新信息技术产业	新兴海洋产业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航天应用
细分行业	观光旅游、休闲度假、文体旅游和健康旅游等	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卫星导航、人工智能等	虚拟技术和数字产业、国际离岸创新创业示范区等	南海天然气水合物、海底矿物商业化开采、海洋生物、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洋工程装备研发与应用、现代化海洋牧等	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和种子	航天科技创新基地

注:作者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中发〔2018〕12号)整理。

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已说明,新中国过去几十年走过的道路其实是一条工业化之路,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进程中工业化是核心动力^[29]。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通过优先推动工业化以推动经济增长和降低农村贫困有其必然性,其作用机制表现为:工业化进程当中所推动的资本深化创造了大量非农就业岗位,吸收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进入城市工业部门,即工业化对于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了渗透效应:一是工业化给农业劳动力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收入。二是工业化同时给农业带来投入要素和更高效率,直接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并增加农业收入^[30]。王文凯(2024)运用1964年近十年的中国西部地区进行大开发的县域数据和地理断点的方法,基于集聚和人力资本视角对工业大推动长期经济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说明,在这期间工业投资越多的县市,当前经济发展水平也越高的经验证据^[31]。上述理论与事实表明:推动工业化过程中资本和劳动力这两种要素组合,以及实现它们所构成的农村和城市两个部门之间的结构性转换,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农村贫困降低存在核心影响。海南以“三农”为基础并以“全岛同城化”为目标建设自由贸易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冲击对实现海南区域经济从传统经济增长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型提供了保障。

虽说工业化是现代化之基础,但不同时期现代化和工业化都有着不同的内涵^[32]。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新型工业化以来,针对新型工业化的内涵与特征及实施路径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33],把“新型”概括为“时代特质”和“国情特质”获得一定共识^[34]。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及数字技术赋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中小企业需融通发展与产业链供应链提升、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的对外开放发展空间及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等内容,将是我国当前及未来若干年时间里新型工业化阶段性之特征^[35]。

由于海南工业化进程以“三农”为起点、岛屿经济特点又以“两头在外”(资源和市场都在外)为目标。这就决定了海南当前工业化的核心内容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阶段性,即海南的新型工业化模式应是城乡一体化和参与并融入国际产业链的工业化。一方面,海南特色的工业化必须把农村和城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且用发展工业的方式发展农业,将工业化产生的众多先进技术、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以及标准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等工业化核心理念引入农业发展中,实现农业现代化进而破解“三农”问题。另

① 2024年海南统计年鉴资料显示:海南全省工业占GDP的比重,从2011年的18.8%一直降到2020年9.7%——其中制造业占GDP7.4%,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33%,全国倒数第二,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过低。

② 比如,在2023年12月26日举办的海口产业投资大会上,海口市主要领导强调“要把工业经济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即“强工业”实际上在2023年已列为省会海口的中心工作;再如,在2024年4月22日海南省召开的加快推动海南高质量发展会议暨2024年市县和省直单位主要负责人第二次工作交流会上,海南省委确定了“稳一产、强二产、优三产”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目标。

一方面,海南的新型工业化必须走“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工业化。尤其在采购原材料或半成品以及来料加工过程中注入中国及海南独特技术、知识、品牌等元素,并在生产的商品销往国际市场的“两头在外”过程中实现大进大出,同时向一般发展中国家出口与化解国内过剩产能^[36]。简言之,海南现阶段的工业化基本要求是多元的。既要中国过剩产能与国际市场潜在需求有机结合,又要扩大海南工业产品的市场空间,还要保护和节约国内及海南资源。这也决定了海南工业化发展路径更加侧重于“走出去”制度安排。依靠东南亚国家地区琼籍华侨华人在海南作合建立“新型工业化园区”,主要是基于海南周边空间合作发展工业化。它既打通海南与东南亚周边国家工业化联系,又是海南与粤港澳区域工业化深化合作与协调发展的新趋势。

新型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既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新征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又是海南抓住全球产业链重组、供应链重塑、价值链重构的历史机遇,还是海南区域经济良性发展过程中不可跨越的产业布局内容。一方面,当前亚洲产业链呈现资源禀赋多样化和制造业层级梯度化等特征。区域内产业关系具有一定互补性,内部分工不断优化且在高科技等领域有合作愿望^[37]。在海南建立“新型工业化园区”,其实质是海南产业往东南亚区域化方向推进,且把海南产业链引入到新一轮亚洲产业链发展趋势中。另一方面,推动琼籍华侨华人在海南建立新型工业化园区,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各地区一次实现双方互补合作和协同增效的新尝试。也就是说,海南可借鉴中马、中印尼、中非“两国双园”建设的有益实践,发挥各方面优势与潜力,探索与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地区各国建设“两国双园”模式,建立差异化管理体制,推动在海南本岛和东盟国家境外分别设立产业发展姊妹园区,更好开展“两头在外”、“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经济合作。进一步地,在海南建立以琼籍华侨华人为主体的“新型工业化园区”并形成中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周边国家“两国双园”新的经济合作模式^①,并以此配合实施“新时代下南洋”计划。

五、东南亚国家琼籍华侨华人在海南开展“合资金融”^②的可行性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配套制度及改革措施之一,将围绕着“构建与海南自贸港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体系”以及切实解决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不同阶段所存在的突出问题为着力点,分步骤、分阶段并采取差异化的方式推进海南金融供给侧结构化改革^[38]。为此,中央12号文对海南新一轮金融改革提出9项要求,在《方案》中金融改革内容占有重要篇幅。以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为目标,在制度设计39项政策中有4项,在2025年前18项重点任务中有3项,其他政策中也有些涉及金融方面的内容,涉及产品、机构、科技、市场、制度等多个层面。在2021年3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还联合其他金融监管机构专门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意见》(银发〔2021〕84号),作为《方案》配套政策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金融改革。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四步走”目标决定了海南金融改革与国内其他自贸区有一定差异性。一方面,海南金融改革要着力于解决区域经济社会建设及“补短板”问题,包括:金融支持房地产业转型升级(如房地产金融风险化解处置机制和海南房地产创新融资模式以及设立房地产投资收购基金和开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金融产品等)和扶持重点产业发展(如结合旅游业、海洋开发、航空航天等产业特点改进金融服务或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以及加大金融支持与培育海南持续新产能)、金融支持“基础设施适度超前”建设新模式、运用金融手段来促进环境保护和解决生态可持续发展与“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以及普惠金融等等。另一方面,海南金融改革还要面临进一步推动海南金融开放机制和金融

① 新加坡是东盟最开放且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它在2023年已成为我国最大累计外资来源国,对华已投资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区、天津生态城、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以及广州知识城、吉林食品区、新川科技创新园、南京生态科技岛等。然而,至今为止,新加坡尚未与我国建立“两国双园”合作模式,海南应抓住这一机会,充分发挥琼籍华人华侨在“新型工业化园区”对接、谋划及建设当中作用,承接广东、江苏、浙江、湖南等省份产业转移和转型升级,打造海南“新时代下南洋”生态平台,从而实现互利共赢。

② 本文所指出的“合资金融”不仅限于公司法层面的股权结构合资形式,而是泛指包括合资设立机构和金融业务契约合作等形式。

开放政策^①有效实施,包括: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如FT账户)、投融资汇兑便利、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与结算中心功能建设、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提升金融服务功能和区域金融合作等内容,为对接国家战略(如与“一带一路”东南亚沿线国家互联互通)还将建立面向全球的金融交易平台体系,为企业“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金融支持。同时,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与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发展面向东南亚的投融资市场和保险产品交易市场;在海南自贸区成立大宗能源、钢铁、黄金、贵金属、棉花、大豆等商品交易市场,推动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和结算交易机制,使得场内大宗商品价格和趋势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海南指数”。

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初期阶段来看,东南亚国家各地区是琼籍华侨华人传统聚集地。海南可聚焦《关于金融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意见》当中“扩大海南金融业对外开放”具体内容,探讨东南亚国家各地区的琼籍华侨华人有关市场主体在海南引进外资过程中的“机会”与开展“合资金融”可行性。包括:设立中外合资银行、参股地方性资产管理公司、设立合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全资拥有或控股参股期货公司以及在海南获取支付业务许可证等,均可尝试在实现海南自由贸易港与东南亚国家金融活动中的有效衔接。

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及“跨境私募通”是海南金融改革当中一项重要使命^[39]。从海南扩大跨境人民币业务和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看,推进海南金融机构对境外企业发放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构建互利共赢金融合作网络,推动跨境本外币投融资业务和基金业务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有效实施,推动人民币对东南亚地区和“一带一路”国家货币直接兑换和实时跨境结算,以及在海南开展与境外同业展开双向债权类资产跨境转让、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合格境外投资者境外投资(QDIE)和内保外贷(债)和外保内贷(债)等业务中,东南亚地区琼籍华侨华人参与对海南各项金融改革措施都将是一种助力。

从海南自由贸易港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机制来看,服务于海上丝绸之路是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重要使命。与此对应,海南金融改革必须重视服务于“一带一路”,其具体举措包括建立“一带一路”投融资平台、人民币跨境支付和清算中心(CIPS)、“一带一路”金融专业服务中心、“一带一路”金融大数据中心、“一带一路”金融风险评估中心、“一带一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一带一路”信用评级机构等。这些项目的有效实施,若有东南亚国家琼籍华侨华人参与,为海南金融“走出去”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将具有重要作用。

六、结 论

《国家侨务工作发展纲要(2016—2020年)》指出:“着力发挥侨务资源在我国各项重大战略实施中的独特作用”,而《中国侨联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进一步强调:“适应海内外侨情变化,按照有目标、有任务、有措施,可落地、可量化、可考核的原则……深化侨联改革、提升服务经济发展能力”。在新时代背景下,琼籍华人华侨拥有参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家乡情”(这种心理和感情上的驱动力是其他群体很难所拥有的)和“硬实力”双驱动力。海南用好东南亚琼籍华侨华人这部分资源(尤其是第二代、第三代侨资),对自由贸易港建设(尤其是向外向型经济转变和加大区域经济外资占比)将起到关键性作用。本文通过对琼籍华侨华人在海南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与时代特征的分析,基于“新型工业化园区”和“合资金融”两个经济合作层面,探讨琼籍华侨华人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以及“新时代下南洋”作用机制,既符合海南发展定位的改革办法,又是务实推动自由贸易港制度有效落实提供一种创新尝试。

与已有研究比较,本文贡献有二:(1)聚焦东南亚国家及琼籍华侨华人群体,在系统性梳理近现代和改革开放以来琼籍华侨华人与海南建设关系基础上,深度分析新时代条件下华侨华人作用机制,探讨琼籍华侨华人在海南新一轮改革中开展经贸活动优势及可能障碍,在拓宽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领域的同时,为完善海南自由贸易港配套制度设计提供参考;(2)实然分析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现有法规和制度背

^① 金融开放内容一般划分为两大类,一是资本与金融账户相关的跨境资本在交易和汇兑的开放度,包括汇率政策、资本项目、人民币国际化;二是金融服务业相关的对境内外金融机构从事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服务的放开及境内外居民或机构参与金融市场交易的放松,包括金融机构开放、金融市场开放。

景下,琼籍华侨华人推动海南与东南亚国家合作建立“新型工业化园区”及“合资金融”可行性,务实探索符合中国国情、海南外向型经济发展定位的改革办法。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关系型”社会,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带有浓厚的“人情”色彩^[40],华侨华人在祖籍地作用机制与方式已获得学界证明。本文围绕中央12号文和《方案》有关海南现代产业体系布局和海南区域经济由“对内”向“对外”转型带来契机进行系统性分析,强调海南在“补工业化”过程中融入国际产业链与价值链之核心观点,探讨东南亚琼籍华侨华人“想参与且有能力参与”可行性,拓宽了自由贸易港研究边界。

值得一提的是,为用好侨务资源且充分发挥这一群体独特作用,海南应当注意以下几点工作方式与方法:(1)要深化海南侨务工作改革机制,推进侨联工作方向性转变。现阶段海南侨务工作要从以国内归侨为重心转向以海外侨胞为重心,为海南区域经济走向东南亚国家各地区、走向世界提供务实服务。(2)要注重华侨华人社团等非政府组织作用。东南亚地区各国与中国国情不同,从古到今这些国家保留了一个社会传统,即宗教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在民间社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41]。(3)在经济合作中要对华侨华人有一定的“所有权”让渡。琼籍华侨华人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走进东南亚市场”路径中除了发挥经济作用外,也在维系和促进中国及海南和东南亚政府与民间和谐关系中扮演独特角色,根据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开展经济合作(如“新型工业化园区”建设和“合资金融”)过程中制定一些针对性政策,让华人华侨拥有一定的所有权优势(指参与企业拥有或掌握某种财产权和无形资产的优势),更符合市场经济价值且更具有现实操作性。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紧紧围绕建设“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N].人民日报,2024-12-17(1).
- [2] 陈经纬.海南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路径和着力点[N].经济日报,2020-07-23(11).
- [3] 范平昕.凝聚侨心汇侨力 同心逐梦新征程[N].海南日报,2023-11-16(A02).
- [4] 龚松柏.邓小平侨务思想述评[J].财经科学,2004(S1):162-165.
- [5]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独特机遇论在新时期中国侨务发展战略中继承与发扬[EB/OL].(2015-03-19).<https://www.gqb.gov.cn/news/2015/0319/35336.shtml>.
- [6] 刘汉军.“大侨务”观引领下的东南亚侨务公共外交发展研究——以海南省为例[J].南海学刊,2022(5):82-90.
- [7] 邵鹏鸣.新时代琼籍华人华侨助推海南自贸区(港)建设[J].国际融资,2020(12):30-34.
- [8] 周伟,武四帅.琼籍华人华侨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研究[J].新东方,2024(2):1-5.
- [9] 王翔.海南人移民东南亚的历史过程[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6):90-101.
- [10] 王翔.近代南洋琼侨的社团与生活[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27-38.
- [11] 侯松岭.华侨华人:移民南洋及其影响[J].东南亚研究,2000(2):21-24.
- [12] 《华侨华人祖籍地作用方式研究》课题组.华侨华人在祖籍地的作用方式研究——对融籍华侨华人创新“作用方式”的实证分析[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4):17-28.
- [13] 夏军.民国时期海南岛经济规划开发述略[J].民国档案,2001(1):105-110.
- [14] 王朝赞,陈永阶.琼籍华侨、华人对家乡的贡献[J].海南师院学报,1990(1):90-93.
- [15] 游海华.论华侨和港澳同胞对琼崖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贡献[J].新东方,2021(3):16-21.
- [16] 林昌华.改革开放以来侨汇收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启示[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8(4):34-41.
- [17] 张朔人.民国时期海南侨汇问题述论[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0):45-49.
- [18] 叶晓静.1950年以来海南侨汇问题述论[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6):215-225.
- [19] 许士杰,章锦涛,吴郁文.海南省:自然、历史、现状与未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7-8.
- [20] 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37.
- [21] 李磊,冼国明,包群.“引进来”是否促进了“走出去”?——外商投资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8(3):142-156.
- [22] 高程,王震.中国差异化分层经略东南亚国家探析——基于结构与局势及其互动的二元分析框架[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12):69-100+157-158.
- [23] 汪群,张勤,李卉,等.华人华侨与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模式及其稳定性评价研究[J].产经评论,2019(1):100-109.
- [24] 王舜淋,张向前.“一带一路”背景下华侨华人与中国企业“走出去”合作机制研究[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8(2):51-60.
- [25] 梁育填,周政可,刘逸.东南亚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关系研究[J].地理学报,2018,73(8):1449-1461.

- [26] 贾益民. 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23):东南亚篇[ML].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156-157.
- [27] 何立峰. 在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引领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J]. 宏观经济管理,2020(7):1-3.
- [28] 曾昭睿,陈经纬.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能否跨越工业化发展阶段?[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0(5): 98-106.
- [29] 张建华. 农业与工业化[J]. 经济研究,2022,57(3):20-24.
- [30] 章元,许庆,郭璟璟. 一个农业人口大国的工业化之路:中国降低农村贫困的经验[J]. 经济研究,2012,47(11):76-87.
- [31] 王文凯. 工业大推动的长期经济影响:基于集聚和人力资本视角的研究[J]. 财贸经济, 2024(10):116-133.
- [32] 黄群慧,李芳芳.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逻辑与路径[J]. 财贸经济,2024,(11):28-38.
-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史丹,李晓华,等. 新型工业化内涵特征、体系构建与实施路径[J]. 中国工业经济,2023(3):5-19.
- [34] 郭克莎. 深入理解推进新型工业化[J]. 财贸经济, 2024(11):17-27.
- [35] 苗圩. 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中一些实际发展问题的思考与建议[J]. 新型工业化理论与实践,2024,1(3):1-4.
- [36] 唐浩. 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新认识[J]. 中国工业经济,2014(6):5-17.
- [37] 李颖婷,崔晓敏. 亚洲产业链:现状,演变与发展趋势[J]. 国际经济评论, 2021(2):145-160.
- [38] 陈经纬. 差异化推进海南自由贸易区(港)金融结构性改革[J]. 银行家,2019(10):52-54.
- [39] 陈经纬,吕东锴. 海南自贸港背景下开展“跨境私募通”制度集成创新的一些思考[J]. 清华金融评论, 2023(5):104-106.
- [40] 贺灿飞,郭琪,邹沛思. 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J]. 世界地理研究,2013, 2(4):1-12.
- [41] 潘一宁. 广东企业“走进东南亚”的主要挑战与华侨华人的作用[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5(1):11-20.

[责任编辑:筱 雨]

The rol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ainan Free Trade Port: "going out" and "entering the Southeast Asian Market"

Chen Jingwei

(Institute of Financ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10)

Abstract: Hainan's adoption of the "Go South in New Era" foreign economic cooperation pla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build Hainan's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chieving the goals of "Go Abroad" and "Enter the Market in Southeast", gradually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continuously integrating into the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chain and value chain, as well as enhance its own value. In this process, Hainanese in Overseas countries possess "Nostalgic Hometown Sentiment", "Great Economic Condition", "Participation's Desire", and "Participation's Ability". Making good use of these resources is crucial for Hainan's development of an export-oriented econom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free trade port. Currently, it is feasible to establish "New Industrial Areas" and carry out "Joint Venture in Finance Industry" in Hainan with Overseas Hainanese as the main body. These initiatives are not only new attempts to deepen complementary cooperation and synergistic efficiency in regional industrialization between Haina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neighboring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but also new modes to practically promote the opening-up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of Hainan Free Trade Port. Based on deepening the direc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reform of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and federation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as well as adopting certain "ownership" transfer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overseas Chinese in economic cooperation, Hainan can achieve industrial interaction between Hainan and domestic regions such a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safeguards for Hainan to "Enter the Southeast Asian market".

Keywords: overseas Chines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new industrialization